

【历史研究】

1942—1943年河南特大灾荒时期的赈灾义演*

郭常英 贾萌萌

摘要:1942—1943年河南各种自然灾害并发,加之战乱、政府腐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河南特大灾荒。在救济河南灾荒过程中,除政府组织的赈灾举措之外,全国各地民间团体组织的义演筹款活动非常醒目。赈灾义演是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义赛为主要类型的社会活动;赈灾义演的组织者以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为核心,特别是各地河南同乡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赈灾的重要辅助手段,义演补充了赈灾资金的不足,为抗战救国培育国民精神,显示了民众在重大灾难之时的互助精神。

关键词:1942—1943年;河南特大灾荒;赈灾义演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7-0136-09

1942—1943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饿殍遍野,灾情严重,救灾形势极为紧迫,因此除政府组织赈灾之外,社会民间团体或者个人通过义演活动筹募资金,不同地区共同捐款捐物救济灾区民众的情况纷纷出现。晚清以来,民间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赈灾,日益成熟的义演活动逐渐成为民间赈灾的常见形式。目前,学界虽然对河南大灾之时的赈灾情况有所关注,然而仅在河南灾荒史研究中略有涉及,义演救灾问题尚无专文研究。^①近代义演始于赈灾,面对河南严重的灾荒局面,各地民间组织组织的义演活动为河南灾民筹募到一定的救灾资金,对河南灾荒救助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中可见民间力量在这次河南灾荒救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不揣浅陋对此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42—1943年河南灾荒及赈灾形式

河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近代以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42—1943年的灾荒是民国历史上的大灾荒,也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此次发生在河南的灾荒是多种灾害并发形成的,既与旱

灾、水灾、蝗灾、霜灾等自然灾害有关,又与战乱、政府腐败等人为灾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941年,河南各地已经受到各种灾害的影响,据资料记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各灾,无所不有,灾情惨重。报灾县份,截至六月底止,已达百余县之多。受灾县份,计受战灾者有南阳唐河等二十三县、受霜灾者有灵宝等八县、受旱灾者有内乡等三十七县、受雹灾者有项城等二十四县、受水灾者有潢川等十一县、受蝗灾者有扶沟一县。”^②由于当时灾民尚有前期的余粮,未能酿成大灾。而1942年灾情仍继续蔓延,“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八九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③“豫省本年灾情惨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灾旱区之麦田,高不盈尺。”^④1943年,灾情愈演愈烈,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豫南、豫东水灾严重,饿死人的现象更加普遍。“全河南一百一十县,三千万灾民,都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广武县,从去年十一

收稿日期:2020-11-05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03)。

作者简介:郭常英,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开封 475001)。

贾萌萌,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开封 475001)。

月到今年三月饥饿致死者有八千三百七十二人,逃亡外出者三万三千一百八十八人,全县各村落中只剩二万多饥民。”“灾荒期间,新郑全县逃出者凡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死亡者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合计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郑州,这河南大都会,最近三月间,两周内饿死人口一千七百名。”“三月一日,郑州警察局捕获一个杀子而吃的‘凶狠的’老婆婆。”“灾民们什么都卖,年轻的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也贩卖给了去灾区贩人的贩子。”^⑤通过不同报纸的记载,可知当时灾害多么严重,之后的饥荒又是多么惨烈!

除自然灾害的影响外,日本侵华战争与国民政府官员腐败等人为因素影响,也加剧了河南灾情。正如灾荒史专家邓云特指出的那样:“战争亦为造成灾荒之一人为条件。战争与灾荒,此两者在表面上本有相互影响之关系。质言之,战争固为促进灾荒发展之一有力因素。”^⑥毋庸置疑,战争更导致灾害的扩大和延伸。而此时,河南还是中日对抗的重要战场。当时,河南三面临敌,豫北、豫南、豫东为日占区,可谓“半壁沦陷”,日军的侵略除了侵占中国领土、掠夺资源之外,也对侵占区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豫东还有部分地区为国民党占领,当时有汤恩伯、蒋鼎文等国民党的驻军,驻军敲诈勒索、肆意掠夺。双方的军需自然加重了当地百姓的经济负担。受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此次河南大面积的旱灾,虽然没有光绪三年和1920年的灾荒那么严重,但是反映出来的灾象、民众的怨惧,以及百姓遭受的饥饿和痛苦,却比前两次严重。主要因为,抗战期间,河南民众承受了很重的经济负担,除少数富户外,一般农民已毫无存储。^⑦当时有报纸文章呼吁:“河南三千万灾胞有三百万人已经饿死,流亡他省的二百万,不立即救济即将饿毙者一千五百万,另外的一千万也都在奄奄一息了!”^⑧这里透露的受灾人数,再次反映灾荒给河南造成的灾难是多么的严重,灾民真的是“待赈孔殷”!加之一些官员隐匿灾情、政府救灾迟缓、官员贪污肥己等人为因素影响,灾民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灾情在进一步扩大。

河南灾荒爆发之后,很快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在各方呼吁下,重庆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均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重庆国民政府派员到豫勘察灾情、拨款赈灾、开设粥厂、办理平糶、采购粮种等。河南省政府开展的救济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自灾荒发生至1942年10月,侧重灾情调查及救灾计划与办法的拟定,包括勘灾、减征实征购数额、制定救灾原则与救灾计划;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照已定计划及办法实施救济,包括赈款、赈粮、平糶、救济灾民、工赈、扶植生产、节约消费等;第三阶段,自1943年3月至6月,此期为春荒严重时期,救济措施包括地方自救、节食救灾、设立粥厂、收养灾童、保护灾贫农民不动产等;第四阶段为救灾善后工作,如招抚流亡灾民归耕,切实兴办农田水利、防治疫病、减免田赋积欠、赓续收养灾童等。^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如1942年,河南省当局拨款100万元,实行以工代赈,“在鲁山、临汝、宝丰、叶县、宜阳等县掘土井281795眼,浚塘1107口”^⑩。政府的这些措施,本来是想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既救济灾民,又兴修水利,实现一举两得的结果,但由于官吏的腐败,以及救灾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整体救灾效果有限。如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拨款2亿元救济河南灾荒,但直到次年3月,只有8000万元到达灾区。据研究者考证:“政府官员们把此款留在省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里的时候,当地官员收到此款后,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⑪因此,实际送到灾民手中的赈款少之又少,并未达到赈灾的预期效果。可知,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促进生产、挽救灾民作用,但整体而言效果非常有限。

在灾荒救助过程中,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纷纷贡献力量。由于灾情严重,不仅河南当地的民间力量较早开展了一系列的赈灾活动,而且全国各地的民间团体也纷纷开展救助行动。各地救灾活动有募捐筹款、广设粥厂、设立收容所、开办难童学校等方式。如1943年,浙江大学学生发起“赈济豫灾”运动,该校教授陈耀寰将自己保存的木刻作品献出,以组织“赈灾木刻画展”的形式募集资金,并将出售门票和卖画所得2200余元,全部用于赈济河南灾民。^⑫还有记载,上海从事修鞋行业的毛先生,听说河南的旱灾极其严重,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他便以修鞋资金救助豫灾,“以劳力所得五百元助赈”^⑬。河南灾荒时期的民间救助,参与者非常广泛,民间团体或个人等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援河南灾区。

当时的民间赈灾形式很多,除上述之外,非常引人注意的是赈灾义演,此类活动非常显眼,而且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势,如上海华北急赈会,这是 1943 年上海各界为救助华北灾荒发起成立的慈善团体,救济豫省灾民也是该会的主要工作内容。华北急赈会通过一系列义演活动筹募经费,举行赛马、演出义务剧,组织足球、篮球义赛,兼及募物义卖与募捐等,^⑭其多种多样的筹款方式在当时影响极大。在该会赈灾活动宣告结束时,收到的各界捐款就达 11230422.34 元,利息也有 54468.88 元。据报纸统计,该会救灾支出为:赈粮 5461849.85 元,赈款 41800000 元。^⑮

战乱与灾荒交织下的河南民众处于极度危困之中,赈济灾荒工作刻不容缓,民间力量为救灾积极行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对河南灾害救济的不足。民间赈灾义演以多样的筹款方式,表达民间力量的存在与贡献。

二、赈灾义演的类型

为赈济河南灾荒而开展的筹款义演,当时主要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赛事等形式进行,多样的筹款演出吸引着观众参与,赈灾筹款活动普遍展开,为筹募河南灾荒救济资金发挥积极作用。

1. 传统戏剧筹款义演

中国戏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活动。

1942 年大灾荒期间,豫剧艺人常香玉正旅居陕西。当她得知老家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遭受大旱、乡亲四处逃荒时,率先在宝鸡开展义演,为家乡赈灾筹款。在旅陕河南同乡会支持下,常香玉经常演剧筹款。对逃难至陕西的河南学子实施救助,是河南旅陕同乡会与常香玉合作的结果。1942 年灾害发生后,有很多河南学生逃亡外省,逃至西安避难的难民学生就有不少。当时西安的建华小学、兴豫学校等民办教育机构专门招收沦陷区的失学、辍学儿童,还包吃包住给予支持,常香玉多次义演筹款给予帮助。随着难民的增多,学生也逐渐增多,学校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如建华小学收容难民学生却仅有一个教室,学校教室远不够用。常香玉在同乡会支持下,义演豫剧一个月筹募资金,将售票所得作为募捐费用,新建两个教室,扩大了该校收容学生的能力和规模,使难民学生有了上课的地方。^⑯常香玉以

豫剧演出形式进行筹款助赈,有明确的针对性,也具有典型意义。

1942 年,同样因为河南重大灾情,河南旅桂同乡会邀请当地平剧艺人及票友,于 12 月 5 日至 7 日在桂林三明大戏院举办平剧义演。当地报纸详细报道了这一件事:“本市各著名票友及艺员均参加,人材整齐,戏码充实,为本市平剧界一盛会。”^⑰此次平剧义演,演出剧目有《拾黄金》《古城会》《生死恨》《花木兰》《花田错》《三娘教子》《鸿鸾禧》《四进士》《御碑亭》《黄鹤楼》《宝莲灯》等传统名剧,深受戏剧爱好者的欢迎,募捐效果显著。义演结束后,相关报刊对筹款数目进行了报道:“公演平剧七天,各界热烈赞助,共筹得赈款约一百万元云。”^⑱从所得赈款可见,此次戏剧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1943 年 2 月,河南旅滇同乡会为了豫灾筹赈,发起成立“筹赈豫灾募捐委员会”,组织平剧义演筹款,并形成声势。据报纸消息,“本月二十六日起公演平剧五日”,收入汇给河南灾区民众。^⑲“开幕前行营刘参谋长耀扬以河南同乡资格,出席报告豫省灾胞现况,闻者感动。”^⑳报纸显示,此次义演原定五日,实际演出七日。组织者将戏剧演出作为赈灾宣传平台,使更多当地民众了解河南灾情,对灾民给予更多同情和支持。

2. 话剧义演筹款

话剧是以对话方式为主的戏剧表演形式,兼有少量唱歌及音乐等,是一门综合艺术表演。话剧通过舞台对话展现剧情、表达主旨,有较为广泛的受众。这种较新的演出形式更吸引民众,且能够结合现实灾情排演新戏,因此,话剧义演在筹赈活动中作用较为突出。

1942 年冬,河南郑州先后遭遇旱灾与蝗灾,郑县组织救济会,发起了“窝窝头赈灾募捐”义务戏,演出话剧《灾民泪》,“葛天民饰老贫妇,王重生饰老贫叟,二人身穿破烂单衣,声泪俱下地说明灾况”,观众受到演出影响,纷纷对灾民表示同情,“观众中有以十元钞票送到台上的,随后不断有以五元、一元关金券捐送者”。^㉑观赏话剧者以都市青年群体为主,剧情表现灾害现实,呈现出河南灾民的困难与痛苦,带给观众以切身感受,引起民众对灾荒的关注和救济,现场捐助者非常踊跃。据统计,《灾民泪》的这次演出,“共得洋一千三百六十九元五角,而当场戏票仅售三百六十九元五角”^㉒,从售票情形及最终

所得资金情况可以看出,现场捐助者甚众,该剧通过情景再现及灾情说明,使观众感同身受,激发起人们的同情与悲悯,现场捐助资金众多。

1943年3月13日至15日,遵义浙大剧团在遵义播声电影院义演,这是针对豫灾赈济而举办的一次筹款活动。演出剧目是由邱玺执导的话剧《蜕变》,该剧全部演职员,均由学生担任。据记载:“舞台有模有样,演出效果更佳,场场获得成功。”^⑳“遵义的老百姓在煤气灯的照明下兴致盎然观看,热烈鼓掌,气氛热烈。”^㉑该话剧是由曹禺创作完成的四幕话剧,内容主要反映抗战现实,“描写一个热爱真理、积极工作的女医生丁大夫,自动参加后方某伤兵医院从事抗日工作的故事”^㉒,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新剧通过演员的艺术表现,暗示新中国之诞生,必须经过从黑暗到光明的“蜕变”过程。特别是此剧的演出,在筹款的同时,也以表现抗战的现实剧情鼓舞民众斗志,加强社会动员。此次义演,既适应了当时抗战宣传的需要,也为救济受困难民筹募了资金,收到一举两得的社会效果。

3. 赈灾游艺会

河南遭受重大灾荒,严重的灾情,不仅牵动各地河南同乡会的关切,还有各地的社会精英人士也在积极为救济河南灾荒组织赈灾募捐。针对河南灾荒的筹款义演,还有不同地区举行的赈灾游艺会。

1943年2月,以赈灾游艺会为名的中西艺术综合表演在重庆举办。据报纸消息,“豫灾筹振游艺会,于昨(十五)日下午八时半在国泰开幕,各界人士热心救灾运动,座无隙地。首由马守义表演魔术,继由胡蝶女士唱《满江红》,曲调函雅,掌声如雷,继演《春秋配》《捉放曹》,全场京剧,至十时余始散。今(十六)日仍为马守义及胡蝶女士唱大同之声,及许如辉先生与大同乐会全体伴做,计长魁之《牧虎关》、卖口善之《空城计》”^㉓。紧接着,2月16日上午8时河南省救灾游艺会“举行各组联席会议,除各组报告外,决议成立宣传委员会,加推周迪生为副主任,王黎醒、胡家□等为委员。该会为将豫各地所寄及该会搜集之灾情影片,编为特刊,共分八大张,一百余幅,张列国泰戏院门前,举行展览。又胡蝶女士在游艺会表演并歌咏,至为精彩,极得观众好评,后至者无票可买。末由名票友演《牧虎关》《空城计》,至十二时后毕。今(十七)日仍有胡蝶女士之表演,预料观众定必更踊跃云”^㉔。其中显示,综合

中西艺术的赈灾游艺会演出中,有各界知名艺人参与,组织者为赈灾筹款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另据1942年《西安晚报》消息:“河南赈灾筹振游艺会,于前(二十)晚假新新剧院,开始公演,上午十二时即售票。一般观众,均深明大义,争先购票入座,尤以一乞丐,亦为义之所驱,以一日乞讨所得之五元,买站票入场,此诚实为楷模。”“今晚之剧目为宋淑云《老羊山》、常香玉《蓝桥会》,两剧为常、宋二伶之拿手佳剧云。”^㉕多样化的筹款义演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筹款所得成为巩县赈灾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当时在巩县流传着一种说法:“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唱戏的。”^㉖其中既隐喻家乡人民对某些人面对灾情无所作为的不满,也包含着对艺人唱戏筹款侠义救灾的感激之情。

4. 体育义赛筹款

体育赛事作为近代传入国内的新式文化活动,受都市民众喜爱,随着竞技运动扩展和体育赛事的发展,多种体育赛事在国内各地普遍展开,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所喜欢的一种文化活动,特别是大城市上海具有较大市场。随着球类活动被广大市民喜爱,义赛内容日益丰富,成为一种迎合民众心理的筹款方式。

民间团体通过举办义赛筹募资金,襄助灾民。在河南大灾荒的赈灾义演中,全国各地的体育义赛也有很多,是义演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重庆,1943年3月,昆明中企篮球队为河南大灾筹款募捐,与重庆五强队精英——谊联队进行比赛。^㉗同年4月,为支持救济豫灾,西安体协与青年会共同举办系列体育义赛,赛事内容主要有篮球、排球和足球,活动连续进行了五日,“共收入门票万余元转交灾区”^㉘。同年5月,成都各界为救济豫灾民众而举办赛马会,先后共举行了六场比赛,“所有门票收入,全部捐作豫灾捐款”^㉙。5月6日,举行的第三场赛马比赛,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观众十万余人,孔副院长、邹委员亦莅临参观”,比赛精彩激烈,“观众掌声雷动”。^㉚在活动进行时,政府要员当场慨捐十万元,在其带动下,引发现场观众的捐助高潮,此次义赛活动取得很好的募捐效果。随后,当地观众购票异常踊跃,筹款活动先后进行了六日,该会门票收入共五十余万元。^㉛从所得款项来看,为赈济河南灾荒而举行的义赛筹款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遍布全国各地的赈灾筹款义演,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具有艺术门类齐全、演员众多、中西荟萃的特点,民众参与热情很高,涉及社会阶层非常广泛,从义演展示以及募捐实效来看,各类义演均有不断增多的观众。义演作为当时较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体现出强烈的吸引观众兴趣的特征,为赈灾筹募资金取得实际效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赈灾义演的组织者

河南特大灾荒发生后,政府赈灾力量严重不足,各地赈灾义演活动主要由民间团体举办,较多筹款义演由民间组织筹办,如慈善团体、同乡会赈灾组织,另有各界知名人士联合艺界共同发起。因此,在 1942—1943 年河南灾荒发生之时,义演组织者主要分为民间团体与知名社会人士两大部分。

1. 民间团体组织义演筹款

近代以来,随着义演活动的不断兴起,由社会团体举办的义演活动在各地风行一时。特别在口岸城市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民间团体与慈善团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在大灾时期成为赈灾义演的主导力量。

参与河南赈灾的主要组织是华北急赈会与同乡会。华北急赈会是在重大灾情发生后,由上海各界组成的专门赈灾团体,于 1943 年 6 月 2 日成立。该组织很快举办筹款义演,如“戏校义演成绩”“伶界筹演义剧”“篮球义赛售票”等,戏校义演成绩显著。该校为“华北旱灾,倡演义戏,业于本月二日假座更新舞台举行。兹将售券所得,连同捐款,计中储券一万二千零八十二元正(中更新舞台应得假座费二千零八十五元,又钱宗范君慨捐五百元),送交贵报馆转充赈款。一勺之助,聊尽棉薄”^⑤等消息,纷纷见诸报端。其他义演活动还有“滑稽会串”与游园大会等。华北急赈会成立不久,即见报纸公布义演成绩消息,“昨日大世界举行义演将全部门票所得,悉数充义举,成绩良好。俟整理后,即可发表。又高乐歌场十二日义舞,点唱及茶资收入暨小神童义演,总共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八元八角”^⑥。同时,“急赈足球赛”也在该会策动下举办,该赛以“华北急赈足球赛”为名,“门券分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⑦。据报纸消息,一周捐款数额“(根据各代收银行报告)总共已达四五二五〇九八三〇元”^⑧。华北急赈会的筹赈收入是面对华北多个受灾省份,成立之初即组织义演,成效显著。

灾难发生之时,河南同乡会遍布全国各地。同乡会是移民组织,也是具有一定实力的民间力量。灾情之下,许多筹赈活动由河南同乡绅商代表来引导,可见同乡会作用日益显著。在灾难之时,旅外河南同乡会关注家乡,全力救灾,义演活动令人关注。1943 年 2 月,河南旅渝同乡会邀重庆市名票,在国泰戏院演出平剧,筹募资金赈济豫灾。重庆票友虽然是爱好戏剧的业余人士,但“他们无论在天赋资质还是唱练功力上,也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实践经验,并不逊色于某些专业戏曲演员”^⑨,票友演剧同样有较强的吸引力。演出之前,同乡会还在百龄餐厅招待了重庆市新闻界,该会常务委员李肖庭在招待时谈道:“河南灾情承《大公报》《益世报》及各报之宣传,一般人始明了其真实性及严重性,今后尚希各报继续努力报导河南灾情真象,本会则代表河南灾民三千万申谢。”^⑩同乡会通过媒体宣传,让更多社会民众了解河南灾情,促使演出更能吸引观众,为赈灾筹款贡献力量。同时在昆明,河南旅滇同乡会为豫灾筹款举行平剧公演。据报纸消息称,参加演出者众多,“有啸天馆主、鸿君馆主、吟梅馆主、凌云馆主、颜小鲁、陈豫源、邹功甫、秦郁文、许星五等均演拿手好戏”^⑪,可见河南同乡会为筹款扩大影响做足了前期准备。

此外,其他各类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是重庆的宗教团体,1941 年 12 月创办,由在渝天主教文化界人士所组成。河南重大灾害发生后,该团体于 1943 年 2 月组织义演筹款,特别邀请中华剧艺社演出名剧《孔雀胆》,演出之前,组织者为告知观众灾情,先由理事长于斌发表报告,告知河南灾情以及该会组织演剧筹赈的意义,^⑫在观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全场观众为之动容,为赈济灾民增砖添瓦。鉴于豫省灾情严重,浙江大学专门组织起“浙大筹赈豫灾委员会”,举行星期球赛、木刻画展、义卖等活动,“预定筹募十万元施赈”^⑬。1943 年 2 月 21 日及 28 日两日,该会邀集本城“各男女球队作篮足球义赛”,“二日共收入一千四百余元”^⑭。同年 3 月,国立中山大学河北同学会鉴于河南灾情严重,组织筹款演出,连演三日为灾民筹款,总共筹得款额“国币三千五百十元零一角”,最后还将演剧时所用的女式旗袍进行了拍卖,以收入充作救济款。^⑮另外,当时国立西北农学院“豫灾学会”也在为赈济河南大灾进行义演,演出得到观众好评,筹款

卓有成效,据记载,此次义演活动募得经费除开支外,“剩余国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六元五角”^④。中华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也为河南大灾筹募赈款,1943年3月至4月,该会组织的义演活动有电影、川剧、魔术等等。^⑤之后鉴于河南灾情极为严重,该会决定延长筹款时间,继续演剧募捐,“在国泰、升平、新川、得胜、二川等剧院,再为振济豫灾各演两星期”^⑥。

由社会团体组织和参与的赈灾义演活动事例有很多,在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各类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活动,表现出为河南灾荒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面貌。

2. 社会知名人士是赈灾义演的核心

社会知名人士,指在公众舆论和社会生活中有身份地位和较大影响的时代人物。这些人物的知名度比较高,有一定的号召力,新闻媒体或公众舆论将此类人物作为关注焦点。因此,他们组织举办或参与的义演活动,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募捐收益,有助于义演活动的成功。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国内政界和国际上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河南大灾发生时,宋庆龄正在重庆,她在当地发起“赈济豫灾”国际足球赛,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筹集资金。足球义赛于1943年5月15日、16日在川东师范球场举行,有中、英、韩四国的四支球队参加比赛。5月15日,“孙夫人亲临主持,当步入场内时,六千余观众俱起立致敬”,“英大使薛穆将士亦随同至场中”,“由英大使开球”。^⑦5月16日,观众倍增,“刘峙总司令开球并与队员握手称谢,国际友人苏联大使潘友新夫妇及英军事代表团要员均莅临参观”^⑧。宋庆龄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此次义赛有很强的号召力,吸引中外人士参与其中,使义赛筹款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净收入为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⑨。义赛所募集到的资金,由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根据河南灾情进行分发。其中75000余元汇交河南洛阳及巩县“工合”组织,用以灾民生产自救之资,并帮助200多名灾民搬迁至宝鸡,^⑩在关键时刻显现其特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各地绅商及各方代表也参与救灾,各地河南同乡会、地方商会以及军政学各界实力人物,是赈灾义演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间组织中成功绅商较多具有很高的威望与号召力,因此,在河南大灾筹赈

中极具影响力,自然成为筹款义演的核心人物。

为赈济河南大灾,上海陆续成立一些慈善团体,均由当地绅商领衔。闻兰亭、袁履登、徐乾麟、徐朗西、林康侯等,均为上海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大多是作为行业巨头、商会会长、商帮领袖,或在文化艺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作为慈善团体的领袖人物,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在此河南大灾之时,举办慈善义演筹款赈灾,自然成为主导赈灾义演的核心人物。1943年,他们组织上海崇德善会,发起筹募救济河北、河南两省旱灾捐款,4月9、10两日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募捐,票价收入全部“充作救济灾民之需”^⑪。民间团体组织赈灾义演,各地均有代表性人物,河南省知名人士在此时所起作用则更为直接。

张钫在河南有相当的知名度,与政界、军界、商界以及学界均有密切联系,可谓地方知名人士。河南大灾荒之时,张钫与艺界人物保持联系,确定筹款义演方案,取得筹款。由于日寇侵略的影响,大灾之时张钫旅居陕西,任旅陕河南同乡会会长。他对筹款活动非常热心,积极倡导义演筹款。1942年,为给前往陕西避难的河南难童创办难民学校——兴豫学校筹款,张钫倡议并支持常香玉在西安南院门进行募捐义演。^⑫1943年,张钫亲自到重庆找豫剧艺人陈素真^⑬,请她到洛阳演出。陈素真响应义演号召,历经艰辛回到洛阳进行赈灾筹款义演。在她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我是个农村出来的土戏子,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却有爱祖国、爱艺术、惜老怜幼的心。我愿为灾民、为孤儿贡献出我一切力量。”^⑭在此次义演活动中,陈素珍所演的《叶含嫣》一剧非常成功,取得“满堂红”的效果,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

另外,大灾期间在重庆组织开展赈灾义演的还有冯玉祥和王宠惠。冯玉祥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会长;王宠惠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此二人均有政治背景,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帮助河南赈灾,冯玉祥及王宠惠发起了“豫灾筹振会”,并与重庆市社会局进行接洽,拟定的救灾办法具体如下:“一、以赈灾名义筹款,如电影公映、戏剧公演、书画展览、音乐会等,二、以赈灾名义募捐,即编印捐册、分头募捐。”据统计,仅基督教教会就通过电影公映、戏剧公演、书画助赈等,获得赈款二十万

余元,统计时捐款活动仍在继续。^⑤

在豫灾筹款义演活动中,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物是重要的组织者,他们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通过义演筹款赈济河南灾民,表达同情与关注。这种方式也反映了该时期义演筹款的社会认可度。

四、河南特大灾荒时期赈灾义演的特点与认识

1942—1943 年河南特大旱灾,是一次多发性的自然灾害,有研究显示,灾害造成约 200 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其境哀鸿遍野,满目疮痍。^⑥在紧张的救灾阶段,国民政府采取急赈、移民、平糶等救助措施,使一部分灾民得到了救济。但同时,严重的大面积灾情,完全依靠政府救灾无疑具有局限性。面对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状,全国各地民间力量以义演形式筹款赈灾,发挥积极作用。在实践中,义演筹款显示出如下特点。

第一,民间力量将募得的赈款及换得的赈灾物资,通过民间渠道直接汇(送)往灾区,避免官吏从中间盘剥。1942—1943 年的大灾荒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同情、关注和支持。除文章前述事例外,1943 年年初,旅居重庆江津县白沙镇的河南同乡也在积极行动,发起成立“旅沙同乡赈灾委员会”,邀请当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以及国立二中同学会白沙区分会会员等,举办义演赈灾筹款。据报纸记载,“二月二十七、八两日晚间假座本镇乡村师范学校大礼堂,公演话剧,并表演游艺”^⑦。此次赈灾筹款演出为期两天,第一天,“观众潮水似地涌进,连查票者都感到难于应付了”,第二天依然是许多人“不迟疑地赶来”。两天演出,由于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筹款取得较好成绩,同乡会把所得资金“除演出的一部分开支外,约有十万元”结余款项,全部直接汇往河南帮助赈灾。^⑧

此时,上海民间组织崇德善会,于 1943 年 4 月 9、10 两日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募捐,票价收入全部“充作救济灾民之需”,并前往无锡购买豆饼、苞米、高粱等物运往河南开封等处,发给灾黎。^⑨如此将筹到的资金直接汇往灾区,将物质直接运往灾区,避免了经手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大限度保证灾民得到救济。

第二,筹赈同时,义演在民众中广泛宣传抗战思想和爱国意识,同时培育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

怀。河南大灾荒发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赈灾义演在筹款同时也在表达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抗战时期的民族认同,是灾荒救助背景下慈善义演的重要功能,对爱国情感与民族精神的发扬具有重要意义。严重的灾荒使河南处于战乱与灾荒相交织的困苦之中,社会生态十分复杂,赈灾义演相对于其他救灾措施,确有其特殊性,但在发动民众捐献资金,以及救灾宣传等方面有强化作用。义演在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战号召力具有积极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保卫中国同盟”,旨在宣传抗战、争取外援。河南大灾荒发生后,为了有效集中救灾资金,她又以“赈济豫灾国际足球赛”为号召,并将义赛收入交由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义赛筹款将抗战与赈灾有效结合起来,救亡与救灾密切结合,客观上“发挥了救灾救国的作用”。^⑩在义演筹款过程中,无论演出内容、演出目的,还是演出效果,均体现出组织者由一般性“社会救助”向高级“民族大义”提升的趋势,义演参与者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充分展现。因此,赈灾义演的社会影响力也日趋明显。义赛所募集到的资金作为赈灾款项,表达爱国情怀,有助于促进民族认同,激发民族精神。

第三,河南同乡会为各地赈灾义演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各地民间组织是赈灾义演的重要辅助者和支持者。民国时期河南人走出本省向外发展的非常多,此时各地民间团体在社会事务中作用日益显著。遍布全国各地的河南同乡会是赈灾义演的主体力量,文章所见,从陕西河南同乡会发起的豫剧义演,到重庆河南同乡会、昆明河南同乡会、桂林河南同乡会以及其他各地同乡会发起的平剧义演及游艺节目大会串等,将当地知名人士和知名艺人联合起来。他们在义演过程中不计个人名利,贡献才艺,大力支持募捐活动,为河南灾区民众提供经济救助与精神抚慰。在豫灾赈济过程中,设立粥厂、设立收容所是具体救灾方式,而资金缺乏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组织义演是最有效、最显著的筹款方式,此类筹款也为各地普通民众参与赈灾提供了机会,充分调动了社会民众的赈灾参与度与救灾积极性。

河南大灾荒处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各旅沪同乡会与其他同乡会遵照国民政府的通告,大都停止

活动。^⑬但事实上活动仍在进行,1943年下半年,旅沪河南同乡会与黄金荣、袁履登、徐朗西等上海大亨接洽,借助于他们的支持,通过《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发布广告为赈灾筹款义演新戏,借皇后大戏院义演。^⑭上海小型报业同时发起“演剧筹赈”。1943年6月,上海小型报业同行主办华北赈灾会“以《上海日报》《力报》《海报》《社会日报》《东方日报》《吉报》《罗宾汉》《戏剧日报》《戏世界》《繁华日报》等十家为当然发起人”,联合举行“演剧筹赈”,对灾情重大的华北五省给予资助。^⑮

五、结语

限于研究的不足与灾荒赈灾统计的缺失,我们无法用数据展示义演的赈灾实效,然而近代自晚清“丁戊奇荒”开始出现的义演活动,每逢灾难总会出现,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增多,成为慈善公益活动常见的筹款手段,这些事实证明了人们对其筹赈实效的认可。

引人思考的是,大灾之时各地赈灾义演普遍开展,义演的欢愉无疑与惨烈的社会灾难形成巨大反差,如朱从兵说:“如果义演救助的是灾民或难民、身处困境之人,受助者可能是悲凉的。”“但几家欢喜几家愁,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⑯笔者认为,义演之所以能快速筹款,与娱乐演出对民众的吸引确有关系,但河南特大灾荒之时,实情并非如此。在资金极度缺乏、赈灾极为迫切的情况下,是传媒舆论所形成的导向力量成就了义演筹款的成效与成功。义演活动是一种实体传媒^⑰，“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⑱。河南特大灾荒期间,各种媒体通过报刊、图片、器物、影像对灾情进行广泛传播,扩大了社会舆论的力量,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加之媒体对赈灾义演活动的广泛宣传,灾难剧对灾情的传递,组织者现场声泪俱下的诉说等,舆论形成的感染力量促使人们伸出援手。不少演出收入比剧场售票收入要高很多,这来自于义演现场受感动民众的直接资助。

注释

①李风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孙晓洁:《抗战时期河南灾荒与救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王冰:《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小静:《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等。
②《豫省各县灾情惨重》,《申报》1941年7月24日。
③《豫灾实录》,《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2月1日。
④《豫省灾情严重》,《新华日报》(重庆版)1942年9月7日。
⑤《简讯》,《解放日报》1943年7月17日。
⑥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8页。
⑦陆林:《含泪饮泣话豫灾》,《群众》第9卷第3、4期。
⑧《人祸加重了天灾》,《解放日报》1943年7月30日。
⑨河南省政府编:《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河南省政府,1943年,第86—89页。
⑩陈传海、杨自然:《1942和1943年的河南严重灾荒》,《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⑪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
⑫贵州省遵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6页。
⑬《修鞋助豫灾》,《申报》1943年4月27日。
⑭《沪华北急赈会成立 筹赈加紧进行》,《申报》1943年6月3日。
⑮《社会福利部嘉勉华北急赈会》,《申报》1944年6月18日。
⑯杨兴、王中新主编:《常香玉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⑰《河南同乡会义演赈灾》,《扫荡报》(桂林版)1942年12月1日。
⑱《旅滇豫同乡演剧筹赈》,《扫荡报》(桂林版)1943年3月6日。
⑲《河南旅滇同乡为豫灾筹赈》,《中央日报》(昆明版)1943年2月12日。
⑳《豫灾筹赈 平剧公演》,《中央日报》(昆明版)1943年2月27日。
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132页。
㉒转自陈本荣主编:《文化西迁到贵州 黔说·城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
㉓转自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编:《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2011年,第142页。
㉔柏彬:《中国话剧史稿》,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84页。
㉕《渝救豫灾游艺会揭幕》,《新蜀报》1943年2月16日。
㉖《豫灾游艺会举办灾情影展》,《新蜀报》1943年2月17日。
㉗《宝鸡举办赈灾游艺会 常香玉演〈蓝桥会〉》,《西安晚报》1942年10月23日。
㉘《豫剧大师常香玉》,《豫剧大师常香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注:当时的安徽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是巩县人担任,但他们对家乡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
㉙《渝市篮球赛为豫灾募捐》,《时事导报》1943年3月23日。
㉚《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体育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9页。
㉛《蓉各界举办赛马会 门票收入捐赈豫灾》,《新疆日报》1943年5月1日。
㉜《蓉救灾赛马会》,《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7日。
㉝《蓉赛马会昨日宣告闭幕 收入五十余万元》,《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0日。
㉞《上海戏剧学校演剧慨捐万余》,《申报》1943年6月4日。
㉟《振济华北灾黎》,《申报》1943年6月15日。
㊱《东华联组合办华北急赈足球赛》,《申报》1943年6月24日。
㊲《华北急赈会昨开常会》,《申报》1943年7月2日。
㊳周简敬著、冯大彪编:《神州轶闻录 大戏台》,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
㊴《豫旅滇同乡公演平剧筹赈》,《益世报》(重庆版)1943年2月11日。
㊵《本市名票参加豫灾筹赈公演》,《中央日报》(昆明版)1943年2月20日。
㊶《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演剧筹款救济豫灾》,《新华日报》(重庆版)1943年2月8日。
㊷《浙大员生募款施赈豫灾》,《南华报》1943年2月15日。
㊸《本校学生自治会赈济豫灾工作热烈进行》,《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第 117 期。④《振济豫灾 中大河北同学会演话剧筹募振款》，《大公报》(桂林版)1943 年 4 月 29 日。⑤《农院青年团 豫灾公演账目清洁》，《西北文化日报》1943 年 3 月 21 日。⑥《关于核查募集灾款公演电影事宜致重庆市警察局、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唯一大戏院等的指令》，重庆市档案馆藏，1943 年，档号：00600014000780000026。⑦《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关于请准继续公演募捐振款上重庆市社会局的呈》，重庆市档案馆藏，1943 年，档号：00600001004730001072。⑧《振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大公报》(重庆版)1943 年 5 月 16 日。⑨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55 页。⑩《渝市点滴》，《大公报》(重庆版)1943 年 6 月 4 日。⑪徐万发：《宋庆龄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年，第 63 页。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举办慈善义演要求免交娱乐捐事与申请人来往函》，上海市档案馆藏，1943 年，档号：U1-4-2408。⑬转自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447 页。⑭陈素真，原名王若瑜，祖籍陕西省富平县，生于河南开封，豫剧“陈派”艺术创始人。八岁随父陈玉亭学戏，改艺名陈素真。十岁登台，十六岁被誉为“豫剧梅兰芳”“豫剧大王”“豫剧皇后”。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 38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97 页。⑯《基督徒筹赈豫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通讯》1943 年复刊第 10 期。⑰李风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中州学刊》2013 年第 1 期。⑱《河南旅沙同乡演剧筹款赈灾》，《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 年 3 月 5 日。⑲宋怀玉：《为豫灾劝募公演》，《国讯旬刊》第 330 期。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举办慈善义演要求免交娱乐捐事与申请人来往函》，上海市档案馆藏，1943 年，档号：U1-4-2408。㉑李爱勇：《娱乐如何救国：近代游艺会“公共空间”的形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㉒上海河南同乡会活动相对较少，与当时的战争状态有很大关系。㉓武强：《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兰州学刊》2011 年第 6 期。㉔《沪市当局暨各团体竭力筹划华北急赈》，《申报》1943 年 6 月 5 日。㉕朱从兵：《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史学月刊》2018 年第 3 期。㉖郭常英：《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 年第 3 期。㉗蒋晓丽：《传者与传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Charity Performance in the Period of Henan's Great Famine from 1942 to 1943

Guo Changying Jia Mengmeng

Abstract: The concurrency of various natural disasters in Henan from 1942 to 1943, coupl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 such as wars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caused a catastrophic famine in Hena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lieving the Henan famine, in addition to the disaster relief measures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ivil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very eye-catching. Disaster relief performance wa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y mainly composed of opera, drama performance, disaster relief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competition. The organizers of the relief performances were centered on var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celebrities, especially the Henan Association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d played an active role. As an important aid to disaster relief, the charity performance supplemented the shortage of disaster relief funds, cultivated the national spirit for saving the na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demonstrated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people in times of major disasters.

Key Words: 1942-1943; the great famine in Henan; charity performance